

《中国经济靠什么赢》连载五

■ 周倩

中国军队当时装备严重落后,后勤万分艰难,最终通过苦战 3 年,才换来国家工业化的重大机遇即相对牢固的中苏同盟。

苏联在 1950 年至 1959 年间,给了中国合计达 54 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的援助(“马歇尔计划”美国援欧资金是 130 亿美元)。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强大外来投资,使中国在 1950 年迅速走出建国初期的经济萧条,开始进入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。

受益于苏联老大哥

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出路,这已是常识,可是,为何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完成工业革命?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,仅仅是建立工厂、进口设备、购买原材料、组织生产销售这么简单吗?绝对不是。

如果没有能源电力、钢铁煤炭、设备制造、石油化工、电子工业、交通运输、商业贸易、银行金融、教育培训等诸多配套产业的协同发展,任何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必定是下盘不稳,出拳无力。

要想“稳固下盘”,建立那么庞大、精密的工业配套和金融贸易体系,没有雄厚的技术和财力基础,怎么可能做到?

正是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援助,中国经济才得到了根本好转,中苏两国不仅在军事、外交方面配合默契,经济合作也大有进展。苏联政府答应援建中国急需的煤炭、电力、钢铁、化工、机械和军工部门的 50 个重点项目(后来追加到 156 项),都陆续得到了落实。

中国得益于苏联援助,到 1959 年,首次拥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,在钢铁、有色金属、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方面,达到苏联 1931 年(苏联“一五”计划完成)的水平,超过日本 1937 年(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)的水平。

在 18000 名苏联专家的耐心指导下,数年之内,中国上百个新建企业,生产出高级合金钢、无缝钢管、喷气式飞机、坦克、大口径火炮、警戒雷达、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、大容积高炉设备、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……

注意:若是按照现今的市场化规则,中国企业要想获得这么强大的制造能力,必须付出巨大代价购买技术资料 and 图纸、引进生产设备、聘请工程师传授生产工艺,还要不时地应付洋人在知识产权上的百般刁难。

苏联老大哥不仅无偿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,还手把手、传帮带教给中国技术人员一些宝贵的细节知识。

从苏联获得大量高价值无形资产(技术专利、知识增量),中国方面确实没有付出太大代价,但是对苏成套设备的进口,则是实行对等贸易。当时中国没有多少外汇(或者黄金)储备,在支付方面有一定困难,双方多是采用实物交换,比如,中国要在 1959 年以前供应苏联 16 万吨钨精矿、11 万吨锡、3 万吨钨、3.5 万吨钼精矿、9 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。

尽管中国从苏联引进资本和技术,工业能力、国家实力得以脱胎换骨,但是客观地看历史,受制于“冷战”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大环境,被战略性的外资投入客观地主导着中国工业化。

2、战后“空壳”的逆势崛起

工业化快速起步的中国,挫折不断,同期中国百年来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,正逆势崛起为世界级工业强国。

1945 年 7 月 26 日,日本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投降,战争结束,日本即被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占领。

美国如何防范日本再次与之敌对

美国要避免日本再次与之敌对,就要从根本上摧毁日本再次挑起战争的工业潜力和战争意志。具体做法是:拆走日本海空军工厂和飞机、轻金属和轴承制造厂的全部设备,以及钢铁、工作母机、造船、火力发电、硫酸及制碱工厂的一半设备,战后日本的工业规模大体上只能以 1931 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前后的水平为限。

工厂和企业,才是国家实力的真正储备地。军事力量,只是技术和产业的衍生品。美国能压制日本的工业实力,但未能压制日本的工业精神。

美国军方曾帮日本制订过一个复兴计划,要日本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全盘接受美国的那一套。政治上实施美国的民主制度,解散财阀,削弱天皇权力,建立一个民选政府;经济上复制美国的自由竞争制度,企业生产什么由市场决定,政府不要干预资源配置。究竟日本适合发展纺织轻工,还是石化重工?政府不要管,让市场自发选择。

欧美国家已经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,日本作为后发国家,如果按照美国制订的“复兴计划”,日本原有什么传统产业就去发展什么产业,那永远别想赶上和超过美国。比如,明治维新之后,日本的纺织工业在世界上有一定竞争优势,如果日本当初主要发展纺织轻工,就不会成为后来的钢铁强国、机械强国、汽车强国。

工业精神不可以被摧毁

1945 年,日本在盟军的空袭以及原子弹轰炸下,败局已定。即将战败的日本,满目疮痍,遍地废墟。

日本本土超过 66 万人死于空袭。建筑物的毁坏,以当时币值计算,竟达 4967000 亿日元,占日本国家财富总额的 42%。工业部门的损害更加严重,日本 56 个产业的生产设备,仅存水力发电等 5 个尚具生产能力,其他产业全部破坏无遗。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,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无法取得,甚至国民的粮食也告断炊。

工人没工做,国民没饭吃,简直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战败地狱图。

可是,盟军在讨论对日作战问题时,认为日本仍有战争潜力——日本还有数万工科大学生未上战场。直到战败,这几万大学生也没在战场上出现。如果把这批未来的工程师打光了,日本民族才真是再无出头之日。

没有煤、铁、石油,也缺少农产品,若是再没了技术人才,日本就真正只剩下一个“空壳”。所以,日本人并非只会一味死战,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,日本即使投降也要保存工程师和科学家。

1945 年战败后的日本,何以能迅速崛起?战争废墟只是表象,日本大量的人才储备还在,工业水平也在,只要有技术有人才,重建一个工业强国并不困难。

3、柔道战略:产业鳄人的攻势

柔道是日本国术,讲究使巧劲,四两拨千斤,以小胜大,与中国太极拳有点相似。

俄罗斯总统普京,也是一个柔道高手,他曾经是圣彼得堡的柔道冠军。普京个子比较小,但意志坚强,战略老到,在和西方国家的较量中,他用了不少柔道的手法。

“经济战”与柔道运动在很多方面非常契合。柔道是以对手的力量打败对手,而不是硬碰硬。我不停地移动着,目的是打乱你事先对我的设想,你铆足了劲来攻我,但总是打不到我的要害,而我总能打到你意想不到的痛处。

日本的对美“暗战”

战后,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扶植,除了“冷战”因素,也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考量。以纺织业为例,美国对日本棉纺织业的援建,是为了推销美国国内过剩的棉花——出口棉花到日本,加工成成品,再返销美国。日本可从中赚取外汇,偿还债务。

美国的扶植加之美国自身是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国、消费国的优势,造成日本产业结构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。日本怎么会坐视自己国家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?

日本采取的措施是:

一、极力扩大“重化工业”的设备投资。1956 年至 1969 年间,日本全部产业的设备投资总额是 21.6 万亿日元,其中 16.5 万亿日元,占比超过 75%,集中在钢铁、电力、造船、机械等传统的基础性重工业,以及现代化学、汽车、石油精炼等新兴重化工业。

二、日本很大比例的外汇储备都用于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。1950 年至 1978 年间,日本共引进技术 31738 项,其中价值很高的甲类技术 21435 项,占到 2/3 以上。

日本甚至动用大量“工业间谍”,费尽心机窃取欧美国家的核心科技。所有日本情报机构 80%的资源都用于美国和欧洲,集中于高科技领域;而日本间谍收集到的情报中 85%~90%是经济情报,其中绝大多数是专利技术。

日本在美国间谍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芯片产业。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,日本政府和商界就瞄准了这一产业,日本间谍在这段时期搜集到美国芯片产业 70%的基线数据,到 1988 年,在一兆字节存储器芯片市场上,日本占了 85%的份额,而美国的市场份额则锐减至 8%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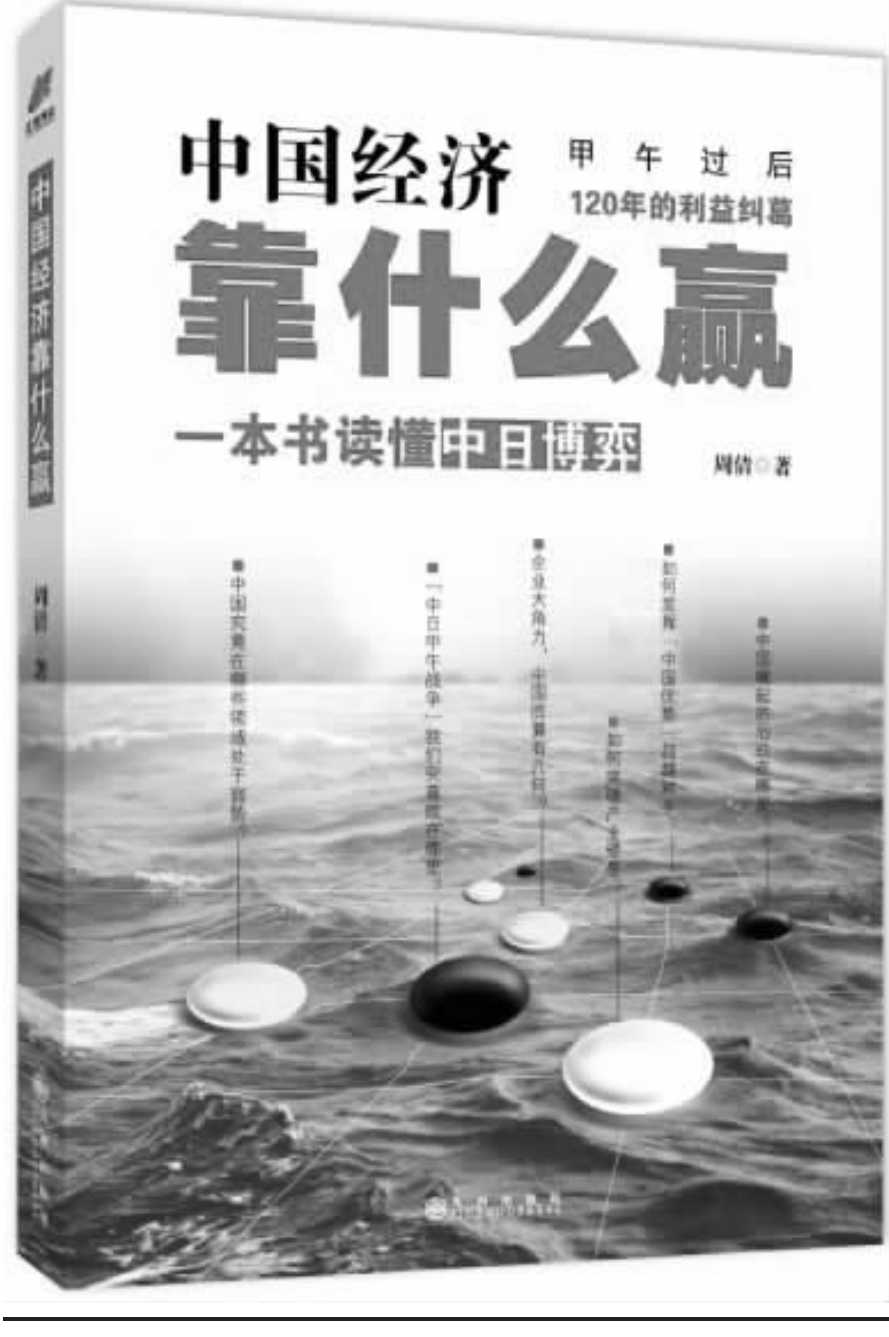
1981 年,日立公司从一名前 IBM 雇员手中,获得最新一代电脑 308X 系列的部分设计资料,这是当时 IBM 公司的最高机密。这个“20 世纪最大的经济间谍案件”,对美国硅谷的攻击,不亚于当年对珍珠港的偷袭。

战后的 30 年里,日本仅用 7 年时间,工业实力就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,仅用了 25 年的时间,就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。近 1000 万解甲归田的日本军人,大部分都进入企业,从热战转而投入“经济暗战”,很快把日本产品卖到当年枪炮也没够得着的地方。

美国已经失去耐心

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曾在钢铁、化工、造船、汽车以及 IT 制造业的发展中下过很大功夫。比如“新日铁”就是在日本政府的政策撮合下,由“八幡”和“富士”这两个在日本排名第一、第二的大企业合并而成的。日本的钢铁企业由此跃居世界钢铁行业的前几位。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,日本钢铁业迅速崛起,竞争力大为提高。1971 年,日本普通钢、热轧薄板 and 冷轧钢板的制造成本,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 56%、70%和 68%。日本在既没有铁矿石,也没有能源的情况下,反而将钢铁业扶持成优势产业。

1955 年以前,日本钢很少出口美国,



作者简介

知名财经作家,私募人士。对产业经济学有独特研究,陆续发表产经评论近百万字。曾为多家职业机构做过投资和企业分析,为大户资金的运作做过操盘策划,有独特的资本经营能力。被誉为“难得的视野极为宽广的财经观察家”。

已出版有《财务总监》《投资总监》《操盘》《操纵》《颠覆:商业模式的危机与新生》等多部财经著作。

1965 年,日本钢约占美国钢铁进口总量的 44%,1968 年这一比例超过 50%。1976 年,日本对美国的钢铁出口总量由 1974 年的 470 万吨猛增至 800 万吨。1963 年就有美国钢企指控日本“不正当竞争”,日本政府和钢铁企业“身段很柔软”,表示要对本国钢铁产品“自愿出口限制”。结果,日本越是“出口限制”,美国钢企丢掉的市场份额反而越多。

汽车业也是类似情况。1975 年,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,出口量达 268 万辆。1980 年一年,日本车企就卖给美国人 395 万辆汽车,只从美国购进汽车 1.05 万辆。1981 年,日本政府和汽车厂商也说要对欧美市场“自愿出口限制”,汽车出口仍达 605 万辆,同年,汽车出口排名世界第二的联邦德国仅出口 215 万辆。

这样一个严重不平衡的市场格局,引发长达 20 年的日美汽车摩擦。在贸易谈判中,日本人总是态度很好,再三鞠躬说,是我们不对,我们要检讨,要反省,我们回去一定要限制出口。不论日本怎么“自我限制”,日本车大举攻占美国市场的局面,始终没有丝毫改变。

直到 1985 年,美国完全对日本失去耐心,直接召集日本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,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,最后签了个“广场协议”,逼迫日元升值。此时,日本车在美国和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。

经济复兴中的压抑感

日本人很想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崛起中,找回失落多年的民族自信。可是,美国的种种“压迫”使日本感到前景不妙。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全球工业品的定价权,日本经济还要仰赖美国庞大的本土市场。

长期受美国人的压制也不是个办法,到 20 世纪 70 年代,日本迫切希望到其他国家开辟市场,力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。日本的工业品产能那么巨大,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提供那么大的消费市场?只有中国。

1971 年,基辛格秘密访华,1972 年,尼克松启程访华前几分钟,才通知日本。这一切使日本十分恼火,称美国搞“越顶外交”。1972 年 7 月,田中角荣首相上台后,于当年 9 月访问中国,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。

是中国人对中国特有感情吗?都是利益使然。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,市场潜力亟待挖掘。

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力,不是想挖就能挖出来的。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不能太差,如果陆路不通、航运不畅,怎么保障物流通?

这个国家的民众一定要有工作,而且不是低质量的工作。一亩地七八个人耕,一尺布两三个人织,这是不行的,生产率太低,民众的收入就很低,哪会有余钱消费?

挖掘中国市场,是在中国工业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获得提升的前提下进行的。

继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援建的 156 个大型项目之后,中国第二次大规模“吸收技术扩散”的计划,启动于 1973 年的“四三方案”。

1972 年,中美关系破冰,尼克松访华,美国解除长达 20 年的对华经济封锁。中国抓住这一时机,准备在 3 至 5 年内,引进 43 亿美元的石油化工与钢铁制造的成套设备。

大量引进西方化肥设备和化纤技术,使中国农业产量因 1973 年至 1974 年化肥产量翻番而大幅增加。城市人口第一次有了“的确良”服装、尼龙丝袜和洗衣粉,然后洗衣机、电视机和电冰箱这新“三大件”消费品问世。

此时,中国最需要做两件事情:一、转向用美日等国的技术和投资改造工业结构,重塑制造业;二、公路、铁路、港口、隧道等基础设施作为“关键和根本工业”,要优先发展。

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铁路、海路运输条件欠佳,大连码头只能停靠 5 万吨级船舶,加上工作效率低下,造成成本上升。大庆油田距离日本仅是中东与日本距离的 1/10,但运费大体相同。

对于制造业来说,基础设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反过来说,如果在哪里建设起新的基础设施,就有可能在哪里形成新的制造业据点。为何后来能在环渤海、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世界级的制造中心?因为那里有着优良的港口设施,对于产品走海路出口海外,是很重要的有利之处。

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,一定要有庞大且持续的资金支持,而直到 1978 年,中国人均 GDP 约为 350 美元,外汇储备仅为 1.67 亿美元。

因为大规模引进西方工业项目和更为昂贵的技术服务,国家几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。中国当时的国力储备,只能支持有限的、缓慢的工业化。

正是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,日资财团开始筹划布局中国。

产业鳄人的中国布局

1977 年筹建期间的上海宝钢,就是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“新日铁”引进技术设备,而三井物产拥有新日铁 20%以上的股权,与此同时,三井财团的骨干企业东芝、石川岛播磨重工与“新日铁”合作成为宝钢的设备

供应商,但是,从此宝钢只能选择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铁矿石。

中国本土也产铁矿石,宝钢为何不用?日方的说法是,“日本制造”的钢铁生产设备无法消化中国低品位的铁矿石。

其实,日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和三大矿山(巴西淡水河谷、澳洲的力拓与必和必拓)签订长期贸易合同,相互持股和共同投资,形成利益共同体。

这就为中国钢铁企业陷入 2004 年之后原材料的价格困局,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,埋下至关重要的伏笔。

1978 年,中国接受日本政府 500 亿日元贷款(2.2 亿美元),从那以后,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,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 66.9%来自日本,总计约 2248 亿元人民币,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、公路、港口、机场等基础设施,以及农村开发、环境保护、医疗、教育等领域。

其中,宝山钢铁一号高炉,鞍山钢铁和武汉钢铁的连轧设备;京秦铁路、南昆铁路、北京首都机场、上海浦东国际机场;横跨长江的五座大桥(安徽铜陵大桥、重庆第二大桥、荆州长江公路大桥、黄石大桥、武汉长江二桥)的建设等都曾获得日本资金与技术支持。

以上路桥、机场等基础设施,是国家工业化的关键和根本。在这方面,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印度。

印度的公路、桥梁、空港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,并且难以供应可靠的电力和清洁的水。班加罗尔被称为“印度硅谷”,但因为公路质量低劣,Infosys(印度最强 IT 企业)为解决雇员上下班问题,每年要额外花费 500 万美元租赁专车。著名工业城市孟买每周要停电一天,难怪英特尔公司最终选择了越南而非印度,作为它新的亚洲芯片工厂所在地。至今,印度的基础设施状况仍在恶化,近年来,印度多家本土企业巨头已经“倍感挫折”“不堪忍受”,决意将工厂迁往海外。

中国政府非常有远见,从 1978 年开始,就将涌入的外资大量引导到交通、能源、通讯这三大基础设施建设上,为后来的产业崛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日本 1978 年之后的对华援助非常及时。当时急需资金和技术的中国,很多大型项目得以启动。若非得益于此,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会迟缓很多。

可是日本不会无缘无故来中国搞慈善事业,人家是有意图的。

20 世纪 80 年代初,全国人大曾就“宝钢问题”质询当时的冶金部长:中国发展钢铁产业为什么不自力更生,要向日本借钱?向日本借钱还不算,为什么要专门拿这个钱买日本的设备?买日本设备还不算,为什么钢厂建成后只能吃进口矿?

现在看来,日本当时的政策其实并无异常。日本借给中国的原本是政策性贷款,条件就是中国得买日本的设备。当时国内对日本的政策目标缺乏了解,把日本促进设备出口的政策,当成“友谊第一”。

日本协助中国建设宝钢厂房,但没有告诉中方地基存在问题,而要中国高价购买日本钢材,坚固地基。宝钢进口铁矿石,还要通过日本港口,用日本 5 万吨船舶转运到上海。中国当时缺乏产业合作经验,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,进口一些价格偏高或没必要的设备,仅宝钢购买新日铁公司技术的费用,就相当于日本战后最大的技术引进项目,东丽公司尼龙技术花费的 100 倍。

日本对华的技术设备、基础设施出口,给日本国内的钢铁、机器制造等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利益。日本也因此以极低廉的价格,从中国获得大量精煤、稀土等战略性资源。

4、“日本经验”在中国复制

中国除了看重日本技术和资金,更看重“日本经验”。

日本人对于比自己优秀的国家(美国),会很爽快地认可,并彻底调查研究对方的强项,谦卑地进行学习。日本制造业,就是从“给美国当学徒”出发的。可是,美国也会面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局面。

打个比方:一个村子里只要有一个木匠就够了,一个木工的劳动效率就足以保证村里人所需的全部桌椅家具,现在又有一个徒弟跟着学。做木工活需要知识积累,是长年累月的积累。现在他跟你学,成本肯定比你自己的摸索要低很多。学成之后,他的家具制造成本肯定比你低。他来做木匠,你就不要做了,就失业了。在这个情况下,你就必须去掌握新的知识,转行做别的,不然你就没活干了。

日本以前在知识积累方面远不如美国,制造业也比不上美国,电子、汽车等产品都是向美国进口。1985 年之前的 30 年里,日本不断从美国那里低成本地获取知识。日本的成本低,学会以后开始做低端产品,低端产品美国就不要造了;而后日本学会制造电子产品了,电子产品美国也不要造了,只负责产品设计;后来,日本制造的汽车质量越来越好,美国是不是连汽车也不要造了呢?

(待续)